



重庆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

重庆出版社

第七辑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第 七 辑

(总第五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
学习及文史委员会 编

重 庆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重庆文史资料·第七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学习及文史委员会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2

ISBN 7-5366-6574-1

I. 重... II. 中... III. 文史资料—重庆市
IV. K29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935 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

学习及文史委员会 编

重庆文史资料第七辑(总第五十一辑)

主 编 罗茂材

副主编 张正杰 杨耀健

编 辑 李邦平 杜宝珍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奇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40 千 插页 4

2004 年 2 月第一版

2004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66-6574-1/K·349

定价:17.00 元

目 录

✓ 回忆小平同志	张文澄(1)
邓小平关心“小字辈”	肖鸣镛(5)
接待雪域使者	味 根(8)
我参加民主建国会活动的一些情况	徐崇林(11)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袁第锐(32)
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纪事	龙铁元(39)
中兴光复会在重庆	裘燕江(51)
抗战前夕渝市附近煤业调查	冯路先(58)
第十兵工厂解放前夕的护厂活动	孔祥云(61)
蒋介石在黄山的最后日子	杨耀健(67)
事于长久坚持处 方彰难得精神真 ——忆念王文彬先生	徐朝鑑(71)
我的恩师杨献珍	於福海(76)
郭沫若与鹿地亘	孙金科(85)
父亲凌谏衡抗日二三事	凌承经 凌承杼 凌承纬(97)
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	许文霞(113)
诗人沙鸥	邓芝兰(129)
我的父亲王大虎	王 薇(139)
影剧评论家王大虎	艾白水(158)
留得残红想春时	

——读《王大虎影剧评论选》·····	穆 仁(161)
在渝经营荣氏企业·····	章剑慧(167)
章剑慧印象记·····	梅 兴(172)
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	冯尧安(177)
广益中学校长杨芳龄·····	江仁祥(181)
文强与吴芳吉·····	何 蜀(186)
蓝文彬办实业·····	李莹华(191)
胡文澜隐居石桥铺·····	魏仲云(199)
老报人王抡植轶事·····	陈未云(203)
逃出青楼·····	董竹君(206)
我是怎样下海说书的·····	王秉诚(213)
✓我在参事室的日子·····	何宏钧(223)
“特园”沧桑·····	杨耀健(228)
忠县的“三反”运动·····	陈懋智(247)
重庆的京剧的兴起和发展·····	汪赫孚(265)
80年代江北文学热回眸·····	万龙生(267)
“沧白堂”与张培爵烈士纪念碑·····	李宗杰(273)
老成渝公路修建梗概·····	张志凡(278)
王家沱与王氏家族·····	曹彪沛(280)
消失的朱家寨·····	朱百城(285)
重庆民间收藏的地域特色·····	林必忠(291)

回忆小平同志



张文澄

1949年11月我响应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号召，在武汉市报名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西南服务团进军重庆，当年12月4日到达重庆，与组织部长魏思文等同志住在大溪别墅“潜园”（现市卫生局所在地）。同月任中共重庆市委副秘书长，1950年5月调任中共重庆第三区（现沙坪坝区）区委书记至1953年5月。在此期间，我多次目睹小平同志的英姿，多次聆听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报告，受益良多。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中共川东区委与重庆市委

1949年11月，在进军途中，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湘西常德宣布中共川东区党委与重庆市委一个机构、两个牌子。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西南一级机关进驻重庆市，立即着手政权建设。大约两三天后，小平同志提出重庆是大工业城市、人口多、工业多、情况复杂，城市工作量大，建议中共川东区党委与重庆市委分开。川东区党委机关，原驻枇杷山“王园”，分开后去了南岸黄桷埡；重庆市委机关则从大溪别墅“潜园”（因“潜园”太小，不够使用）搬进“王园”。此事被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知道后，他对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陈锡联和第二书记张霖之说：“枇杷山最好开辟为公园，目前市委可暂住那里。反正要开辟成公园。”

张霖之立即向市委全体成员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1954年冬，西南大区一级机关撤销后，市委迁中山四路，便按照小平同志

的原指示，将“王园”所在地改建为枇杷山公园，将部分办公用房分别拨给重庆市博物馆和重庆市图书馆。

关心地下党同志

1949年12月中旬的一天，进军干部与地下党同志举行会师会。会场在“曙楼”（原国民党市政府所在地，现儿科医院住院部），我担任会议司仪。会议开始前，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于江震汇报第一届中共重庆市委委员组成情况，并把名单送给小平同志审阅。小平同志仔细看过名单后问：“名单中是否有原地下党的同志？”于江震说有。小平同志点头认可道：“好，好，不要忘了地下党的同志。”

刘伯承、张际春、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会议开始后，邓小平代表西南局宣布了市委委员名单，他们是：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任白戈、李震、康乃尔、张文澄。他勉励大家搞好团结，努力工作。

关心上层统战对象的思想改造工作

1951年秋天，我受市委委派前往巴县，协助巴县县委搞农村土改工作。在一个月协助土改工作中，亲身感受了小平同志对上层统战人士的关心和党的统战政策的强大感召力。

当时西南地区有许多上层统战人士，西南军政委员会吸收了刘文辉、但懋辛、熊克武、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分别担任副主席、委员等职务。农村土改工作开始后，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西南统战部安排这批统战人士到巴县参观土改。他们住在南泉。县委凡是召开土改工作会议，每次都请他们列席，还组织他们下乡参加土改活动。这对他们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记得一天晚上县委在南泉公园召开土改小结会，我结合党的土改政策作工作小结，大约讲

了三个小时，刘文辉等统战人士都认真作记录。

据曹荻秋市长事后告诉我，刘文辉在向西南局统战部汇报时说参加土改，思想上震动很大，特别是听了张文澄的讲话，对土改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较深的了解。曹荻秋还问我：“你对他们讲了什么？”我开玩笑说：“臭骂了他们一顿。”实际上是我将青少年时知道的四川军阀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的惨情，结合小平同志对新区提出的土改政策，讲了土改的必要性和对各个阶层的具体政策，其中包含了统战政策，讲事实、讲道理，说得他们口服心服，完成了市委交给我的任务。

关心城市民主改革政策

1951年上半年，城市的民主改革工作开始起步。对于这一新生事物，我们没有经验，于是便组织力量深入磁器口、小龙坎等街道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城市的民主改革情况复杂，人员成份难以确定，不能简单照搬农村土改的那套。如商人就包括资本家、小企业主、小商小贩等等。民主改革对象不明确，政策吃不准。我们又认真学习西南局和市委有关文件，提出城市小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如开业医生），不算民主改革对象，而应类似农村的中农，作为团结对象的设想，用第三区区委名义，给重庆市委写报告，市委又把报告上报西南局。小平同志亲自批示“同意”，并建议加上西南局批语，在《西南工作》上全文刊发，指导了整个城市民主改革工作。

举家入京

1952年7月，因工作需要，党中央调小平同志入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小平同志接到中央通知后，不讲任何条件，毫不拖泥带

水,很快安排好西南局工作,立即举家北上。由于去得太快,以致到北京后,中央有关部门尚未为小平同志及其家属准备好住房,他们全家只好住在招待所内。事后听市委书记张霖之和市长曹获秋讲,毛泽东主席对小平同志此举十分赞赏,大加表扬,认为他干脆果断,不讲价钱。“人才难得”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

1953年5月,当市委决定把我从第三区调到市委宣传部时,我也以小平同志为榜样,不讲价钱,愉快听从党安排,未带一人一物离开了辛勤工作三年之久的第三区。小平同志“举家北上”的史实,对后人特别是当代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形成讲原则、守纪律、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大有裨益。

邓小平关心“小字辈”

肖鸣鏊

1949年12月8日，小平同志偕西南局其他领导同志，从南川乘车进入刚解放9天的重庆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小平同志在1950年1月17日一次军队干部会议上，尖锐地指出：“仗还没有打完，有90万国民党军队尚待改造，有数十万土匪尚待清剿；有6000万基本群众尚待发动；农村基层政权尚未建立；封建势力原封原样保持着，手中仍然掌握着武装……而我们自己的力量呢？军队地方只有60万，依靠60万，改造60万，发动6000万，消灭封建土匪势力。”

在另一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说：“我们有15万到90万地方干部，其中老区和军队的约共3万干部。不算军队，只有3万共产党员，而青年团员只有极少数。”日理万机的小平同志不忘关心“小字辈”。

1950年4月，以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发出关于青年工作的第一个指示，即《关于目前建团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特别指出：“在当前党的基础较为薄弱而又不能大量发展党员的情况下，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使之成为党的后备军，成为党和政府的得力助手，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而且是具有充分条件的。”指示还提出了目前团的工作应以城市为主的部署，新区建团的方针，以及如何在学校、工厂中建团的做法。

1950年5月，团西南工委和重庆市工委联合召开了庆祝“五四”青年节暨建团一周年纪念大会。会上，小平同志作了三小时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国青年自‘五四’以来，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崇高的理想而英勇奋斗。今天，青年一代要为巩固政

权、建立国家继续百折不挠地进行斗争。而青年本身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业务、学习技术，为创造美好的将来准备条件。”小平同志的讲话极大地激发了青年的革命热情。

1950年9月，团西南工委召开第一次青年工作会议，小平同志亲临讲话，谆谆教诲青年团干部要过好“土改关”，特别提醒团的领导干部要保证党对团的领导。

1950年11月，以小平同志为首的西南局，又发出了《进一步开展青年团工作的指示》。再一次重申今后团的总方针仍以城市为主，在不削弱学校工作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青工工作，还具体规定了农村建团的方针、步骤。1951年4月，西南局又专门发了《土改中建团的指示》。

小平同志不仅关心青年团工作的方针大计，还多次与团西南工委机关干部、西南团校干部和学员、西南区学生代表会面，或作报告或亲切交谈，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原团西南工委干部回忆道：记得是1950年秋一天下午，原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徐怀淳及研究科钱开慧突然得到通知，到机关小会议室去听报告。副书记康乃尔陪同小平同志走进会议室。小平同志身穿黄呢军便衣，态度和蔼可亲，不断向大家微笑点头致意。室内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我们是多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那么近地同小平同志坐在一起，听他作报告。小平同志首先表扬了团西南工委的工作。接着反复告诫说：青年团的工作切记要服从党的领导，要成为党的可靠助手和后备军，要戒骄戒躁团结西南各族广大青年，不要脱离群众，在党的各项中心工作中发挥青年人的先锋作用。他还说，青年人各方面不成熟，工作中难免犯错误，对政治原则性错误要尽量避免，认识错误，迅速改正。怎样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呢？主要的办法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策，了解形势，掌握情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来处理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小平同志鼓励我们说：青年团的干部有一个优点就是年轻，青

年人热情，干劲大，“初生牛犊不畏虎”。但也有缺点就是缺乏经验，这就要“学习、学习、再学习”，要虚心，要团结。最后他说，西南区的青年工作重任委托青年团了，也就是在座的同志们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大胆放手开展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些，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1950年7月，团西南工委机关刊物《西南青年》创刊，小平同志挥毫为《西南青年》题词，写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12个清秀而又遒劲的大字。

1951年6月，西南区少年儿童队队刊《红领巾》出版，小平同志在百忙之中，把创刊号从头看到尾，还连声称赞：“不错！不错！”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有些工作政府部门一时管不过来，小平同志就放手让青年团去办。

例如体育活动就是各级青年团组织开展起来的，直到各级政府体委成立为止。又如小学教师工作在解放初期也是团委少年部在分管。

1952年小平同志调离西南局到党中央工作，他领导下的西南地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青年团从1950年初的3万地方团员发展到44万人。青年团支部遍及西南地区的工厂、学校、农村，成为一支极为活跃的力量。

50多年后的今天，在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前夕，我们满怀激情回忆他对青年团工作和青年干部的关怀时，仍然激动不已。

接待雪域使者

味 根

1951年春，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一个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途经重庆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商谈和平事宜。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设在重庆，要负责接待过路的西藏客人，接待任务由交际处负责。那时刚建国不久，有关部门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甚了解，认为只要把伙食标准提高，并提前为客人预订好车船票就行了。

邓小平听说了这件事，专门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邓小平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纵横比较中，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如唐朝和番。解决西藏问题要多靠政治，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他语重心长地说，西藏是祖国大陆上未解放的最后一块国土，如果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和平解决西藏问题，那就是一大幸事。因此接待工作千万不能马虎，事无巨细都应事先想到。

在邓小平的关心下，交际处特意成立了一个接待班子，不仅配备了藏语翻译，还调来了会做藏式菜肴的大厨师。听说藏族有献哈达的礼节，邓小平还指示，要用上等的丝绸做几十条哈达备用。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交际处打听到解放前重庆有个“班禅驻京办事处”，该处负责人孙格巴顿深明大义，拥护班禅通电起义，已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就前去向他请教。孙格巴顿提供了不少关于西藏风俗方面的规矩，交际处都一一作

了笔记,并按要求去做。鉴于国民党特务惯于用暗杀手段挑起民族矛盾,决定将西藏客人安置在“范庄”招待所下榻,这里与中共西南局大院仅一墙之隔,便于加强警卫。客人即将到达的前三天,招待所特意布置了几间高级住房,室内配备了地毯、沙发,其他日用品也全换成了崭新的,门窗和家具擦拭得一尘不染。

4月16日,西藏代表团一行12人到达重庆。他们刚下汽车,就进入了热情洋溢的欢乐海洋。只见数千名群众肃立在整洁的马路两旁,夹道欢迎来自雪域的贵宾。人民解放军的军乐队吹奏着嘹亮的乐曲,工人们敲着腰鼓扭着秧歌,少先队员们捧着大束大束的鲜花,市民们高举着一幅幅彩旗和毛主席的画像,随着领呼者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号:“热烈欢迎西藏同胞!”“汉藏人民是亲兄弟!”“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尤其令西藏代表团成员感动的是,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亲自出面迎接贵宾,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市的党政领导也到场迎接。邓小平与领队的阿沛·阿旺晋美亲切握手,把在渝的领导同志介绍给客人,然后他与客人一道穿过夹道欢迎的群众队列,他走在左边,阿沛·阿旺晋美走在右边,其他人员则分别跟在他们身后。邓小平一直把客人送到招待所的房间内,看到客人被安顿下来才告辞。

次日一早,邓小平又亲自到宾馆,看望阿沛·阿旺晋美等人。当西藏代表团成员们收到山城各界群众敬献的哈达,吃到可口的藏族饭菜时,都感受到汉族兄弟的温暖,再三道谢,并向邓小平等首长回赠了洁白的哈达。

此后数天,根据交际处的安排,西藏代表团参观了重庆的纱厂、毛纺织厂。工厂的负责人对西藏客人说,重庆的纺织工业十分发达,如果今后西藏能供应羊毛,这里愿意全部收购。西藏代表团成员们表示,只要和谈成功,藏区民众愿为建设祖国、繁荣边疆贡献力量。西南土特产展览那几天刚开幕,西藏客人应邀观展,所到

之处均受到热情接待。展品中有来自西康的牛羊皮、狐皮、猢狲皮、绵羊毛、麝香、青稞酒和部分粮食制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各种五光十色的手工地毯、挂毯，吸引了许多观众。西藏代表团的土登列门、登增顿珠两位代表高兴地说，人民政府有诚意开发西康、西藏的资源，藏族同胞就有希望过上幸福日子。

4月19日，邓小平、贺龙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正式会晤和宴请西藏代表团全体成员。阿沛·阿旺晋美在会见时说，争取达赖喇嘛从亚东回来是上策。如果达赖不回来，也要打通西藏地方政府的思想，使前线藏军退回，让解放军和平进藏，免得生灵涂炭。

邓小平向西藏代表团阐述了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一再坚定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是要坚决认真执行的。他高度评价了阿沛·阿旺晋美在关键时刻服从民族团结大局，从西藏广大民众的利益出发力主和谈的选择。邓小平还说，过去藏胞长期受到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压迫，有些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政府一定要用事实来取得藏胞的信任。他说，要认识到达赖回来、和平进军的好处，希望代表团把这些问题跟西藏地方政府讲明白，和平谈判就会成功。

四天的观光结束，西藏代表团成员们满意地离开重庆前往北京。送走了客人后，邓小平表扬了交际处的同志。他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兄弟般的团结友爱来源于相互间的尊重。我们在这里累一点、忙一点不算什么，进藏的战士就可以少流血，少流汗。”

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听到这个意料中的好消息，邓小平欣慰地笑了。

我参加民主建国会活动的一些情况

徐崇林

解放前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活动，我是自始至终都参加了的。我回忆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5年8月至1946年4月，民主建国会经过酝酿、成立、开展活动的阶段。第二阶段：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民建重庆分会进行公开和半公开活动的阶段。第三阶段：1947年11月至1949年11月30日，民建重庆分会转入地下活动迎接解放的阶段。

第一阶段(1945年8月—1946年4月)

一、民主建国会成立的过程

在抗日战争胜利和国共和谈的鼓舞下，陪都重庆的民族工商业界人士纷纷起来，要求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实现和平建国。刚从延安访问归来，与工商界金融界有密切联系的中华职教社创始人、教育家黄炎培，于8月21日偕同杨卫玉往访工业家和迁川工厂联合会的负责人胡厥文，与他商谈胜利后的动向和组织政团的设想。他们的志趣相同，都有同感。因此，又相约于同月28日同访经济学家章乃器，商谈具体组织问题。其后，分别以各种方式与有关人士交换意见，如个别谈话、三五谈心、座谈会、聚餐会等，又将意见集中起来，研究参考。

在聚会中，大家各抒己见，谈的范围很广泛，涉及中国社会性质、当前形势、对抗战胜利后政治、经济问题的主张，以及建立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章乃器、施复亮和一些

工商业者和大学教师，都谈了自己的看法。例如 1945 年 11 月初在江家巷迁川大厦举行了一次大型座谈会，座谈有关民主等问题，与会者发言踊跃。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在会上谈了他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以及对当时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张。

另一次在陕西街“华康”银行举行的聚餐会上，鄢公复谈起他在北京大学时，曾参加过“五四”运动，还参加学生游行扛过大旗，表示赞成争取民主。施复亮谈到，就他本人的经历来看，国民党政权不可能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大家必须组织起来，各种力量必须配合，才能争取民主权利。章乃器也概括他的亲身经历和与中共一些负责同志交换意见的情况，觉得要争取民主，确实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根据多次交换意见，在酝酿成立民主建国会问题上，大家在认识上基本统一了下面一些主要问题：

第一，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眼前是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保护工商业，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经济。要消灭的是封建经济、殖民地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第二，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应建立多党派合作的政治制度，和平建设新中国。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并在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的条件下，实行军队国家化，不赞成军人干预政治。因此，后来在民建的章程中，明确制订出了不吸收现役军人加入的条款。

第三，抗战胜利后的外交政策，应实行联合苏、美、英、法，反对法西斯的和平外交政策。

以上有些意见，后来在民建章程中有所反映。我个人回忆，民建会内部当时就有人觉得某些主张是有问题的，但大部分主张是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这就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同国民党划清了界限。事实上，民建会的一些主张在当时是有积